

·调查与思考·

失地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 风险的影响分析*

秦立建 蒋中一

【摘要】文章使用 2003~2007 年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行为加大了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显著低于有地农民的健康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征用农村土地时补偿政策不太合理。只有完善现行的征地补偿政策,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增强失地农民的收入获取能力,才能提高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

【关键词】城市化 失地农民 健康风险

【作者】秦立建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蒋中一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为城市发展用地,导致失地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现有 5 000 万失地农民(吴秀娟等,2009)。由于失去了土地,大约 60%的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呈下降趋势,由此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张书旗,2010)。以往学术界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失地对农民养老问题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失地对农民健康的影响。根据 Grossman(1972)的健康需求理论,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且能够生产“健康”的天数,增加劳动供给时间,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获取能力。

袁杰、吴广明(2008)和中国财政学会课题组(2011)认为,目前给予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较少,如果按照目前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计算,失地农民的补偿款只能维持 7 年的基本生活;而按照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计算,则失地农民的补偿款仅能维持 2 年多的基本生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制衔接研究”、安徽财经大学重点科研项目“农村迁移劳动者的流动与健康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与障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活。因而,失地农民无力进行必要的健康投资。Sharron(2006)和代宝珍等(2009)发现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较低,失地农民居住地区的公共卫生环境较差,认为加强失地农民的健康投资可以起到缩小城乡差距和促进城乡医疗公平性的作用。吴秀娟等(2009)研究了苏北失地农民的健康状况,发现失地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比较严重。Zhu(2006)、Campbell(2010)认为,提高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可以减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应该强化政府在失地农民健康投资中的责任,促进失地农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以上关于失地农民健康问题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实证分析。本文将利用大规模的农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失去土地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为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16个省份)的观测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2007年。样本的地区分布较为合理,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5个、6个和5个省份,样本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调查样本的选择方法是,在各省内,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各县分成高、中、低收入水平县,然后将各村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成高、中和低收入村,最后按照等距离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调查农户,每个村随机抽取50个农户。调查农户所有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以及家庭的生产、生活状况。最终选取190个村的9500个农户,每年约40000人,5年共计194755个农村居民。

遵循Glauben(2008)的思路,本文选取18~65岁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并且5年均接受调查的个体作为研究样本。经过数据清理,得到102495个样本。其中失地农民为14660个样本,占总样本的14.3%。失地农民占总样本的比重,由2003年的11.99%上升到2007年的16.48%,说明失地农民的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失地农民的地区分布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失地农民的样本占71%,中部地区占16%,西部地区占13%。东部地区失地农民的比例较大,这体

表1 分年份的失地与有地农民的健康状况 %

	全部样本	失地农民			有地农民		
		全部	男性	女性	全部	男性	女性
2003							
较好	55.54	49.10	53.07	44.45	56.44	60.26	51.84
较差	44.46	50.90	46.93	55.55	43.56	39.74	48.16
2004							
较好	57.59	54.13	58.31	49.29	58.17	61.90	53.72
较差	42.41	45.87	41.69	50.71	41.83	38.10	46.28
2005							
较好	58.55	54.31	58.46	49.57	59.21	62.91	54.75
较差	41.45	55.69	41.54	50.43	40.79	37.19	45.25
2006							
较好	59.83	55.28	59.17	50.87	60.73	64.39	56.29
较差	40.17	45.72	40.83	49.13	39.27	35.61	43.71
2007							
较好	59.84	54.42	58.11	50.22	61.01	64.52	56.77
较差	40.16	55.58	41.89	49.78	38.99	35.48	43.23
总平均							
较好	58.27	53.64	57.59	49.10	59.08	62.77	54.64
较差	41.73	46.36	42.41	50.90	40.92	37.23	45.36

现了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更快的特点。

如表1所示,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低于有地农民。有地农民健康状况较好的比例高于失地农民,2003~2007年二者的差异并无明显变化。2003年,有地农民中自评健康较好者占56.44%,失地农民中该比例为49.10%,二者相差7.34个百分点。2007年,有地农民中自评健康状况较好者占61.01%,失地农民中该比例为54.42%,二者相差6.59个百分点。在失地和有地农民中,男性的健康水平普遍高于女性。

本研究样本中,自评健康状况较好者的比例为58.3%,健康状况较好者的比例高于较差者。男性受访者占54.47%,接近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性别比例(国家统计局,2011)。本研究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126年,有8.6%的样本接受过职业培训。受访者的平均家庭规模是4.37人,接近Glauben(2008)研究中4.13人的家庭规模。家庭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是0.18人,略高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家庭老人的数量(国家统计局,2011)。本研究样本中15.39%的受访者家庭是党员家庭;0.20%的受访者来自五保户家庭。有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本文有关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较好者为1,较差者为0	102192	0.583	0.493
是否失地	受访者家庭没有土地为1,有土地为0	102339	0.143	0.350
性别	男性为1,女性为0	102495	0.545	0.498
年龄	年龄连续年数,单位为年	102495	41.206	12.318
教育	接受学校正规教育年数	102495	7.126	2.684
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	接受职业培训并有结业证书者为1,否为0	100972	0.086	0.281
务工或经商收入	一年中外务工或经商收入,单位为元	37472	7414.649	41512.110
自雇者	收入主要来源方式是自主经营	97375	0.618	0.450
受雇者	收入主要来源方式是受雇他人	97375	0.289	0.391
合伙工商经营者	合伙经营,但生产规模未到达企业标准	97375	0.023	0.148
私营企业经营者	经营私营企业者	97375	0.010	0.101
其他	以上收入主要来源方式类别中未包括者	97375	0.060	0.238
家庭规模	受访者家庭成员数量	102495	4.371	1.541
家庭老人数量	受访者家庭成员中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	102495	0.175	0.455
家庭医疗支出	家庭一年中医疗费用支出,单位为元	58487	941.565	3591.520
家庭住房价值	受访者家庭年末拥有房屋价值,单位为元	100713	31788.180	72680.250
是否为党员家庭	受访者家庭中是否有党员,有为1,否为0	101965	0.154	0.361
是否为五保户	受访者是否为五保户家庭,是为1,否为0	101969	0.002	0.045
西部	受访者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	102495	0.239	0.426
中部	受访者为中部地区农村居民	102495	0.398	0.490
东部	受访者为东部地区农村居民	102495	0.363	0.481

三、计量方法

根据 Grossman(1972)的健康需求理论,个人健康状况主要受个体的性别、年龄、教育和家庭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 Probit 二元选择模型考察失地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具体模型为:

$$Health_i^* = \alpha_0 + \alpha_1 X_1 + \alpha_2 X_2 + \alpha_3 X_3 + \alpha_4 X_4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1)中 $Health_i^*$ 是第 i 个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它是受一系列个人和其他因素影响的函数。当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较好时,其值为 1,较差时则为 0。 X_1 是个人特征向量,包括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和职业变量。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的健康状况好于女性(赵忠,2006)。随着年龄的增加,人力资本的折旧率逐渐增加,导致健康的影子价格上升,健康状况越来越差(Grossman,1972;赵忠,2006)。健康状况也受外出务工或经商收入的影响,外出务工或经商收入越多,则个人健康投资的能力越强,能够促进个人健康水平(苑会娜,2009)。同时,由于年龄和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Fletcher 等,2011),因此,本文将年龄和教育的平方项纳入控制变量。 X_2 是家庭特征向量,包括家庭经济特征,如家庭规模、家庭老人的数量、家庭医疗支出费用,以及年末拥有居住房屋价值等。家庭的社会属性特征,如是否为党员家庭和五保户。家庭老人的数量越多,则家庭负担越重,将降低个人的健康投资,从而危害个人健康。年末拥有居住房屋价值越大,则家庭分配给个人健康投资的能力越强,进而提高了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党员是农村居民中的精英,个体素质较高,健康意识也相对较强。五保户的生活还需要依靠村集体帮助,个人健康投资的能力较低,将增加个人的健康风险(Zhu,2006)。 X_3 是家庭是否有土地虚拟变量向量,该变量是本文关注的主要变量,没有土地,农村居民便失去了传统的生活保障,将增加个人的健康风险。 X_4 是地区和年度特征虚拟变量向量,控制了医疗卫生条件的地区差异,以及国家卫生投资和医疗保障政策的年度变化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另外,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外出务工或经商收入、家庭医疗支出和家庭拥有住房价值,均以 2003 年为基年进行了 CPI 调整;为了减少数据的非正态性,将上述数据取对数进行处理。

四、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表 3 显示了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计量回归结果。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主要关注失地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型一考察了在控制个人基本特征变量时,失地对农民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了职业特征变量,考察在控制农村居民职业分层的条件下,失地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模型三加入了地区和年度虚拟变量,考察在控制了地区和年度差异的情况下,有无土地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模型四加入了家庭特征变量。模型一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只控制个人基本特征变量的情况下,失去土地

表3 失地对农村居民健康影响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个人特征				
性别	0.157***(0.016)	0.159***(0.016)	0.161***(0.016)	0.175***(0.020)
年龄	0.001(0.004)	0.001(0.004)	0.000(0.004)	0.001(0.006)
年龄平方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受教育年限	0.096***(0.010)	0.096***(0.011)	0.096***(0.011)	0.117***(0.013)
受教育年限平方	-0.005***(0.000)	-0.005***(0.000)	-0.005***(0.001)	-0.006***(0.001)
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	0.230***(0.023)	0.229***(0.024)	0.235***(0.024)	0.247***(0.031)
务工或经商收入对数	0.032***(0.002)	0.034***(0.003)	0.028***(0.003)	0.034***(0.003)
职业(对照组:自雇者)				
受雇者		-0.052***(0.017)	-0.055***(0.017)	-0.003(0.023)
个体合伙工商经营者		0.151***(0.044)	0.155***(0.044)	0.247***(0.059)
私营企业经营者		0.371***(0.071)	0.384***(0.071)	0.444***(0.090)
其他		0.086***(0.029)	0.087***(0.029)	0.156***(0.039)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数				-0.030***(0.007)
家庭老年人数量				-0.033*(0.020)
家庭医疗费用对数				-0.038***(0.005)
家庭住房价值对数				0.024***(0.005)
是否为党员家庭				0.041(0.026)
是否为五保户				-0.036(0.199)
有无耕地	-0.073***(0.019)	-0.081***(0.019)	-0.073***(0.020)	-0.251***(0.028)
地区虚拟变量				
中部			0.047***(0.018)	0.038(0.024)
东部			0.008(0.018)	0.132***(0.023)
年度虚拟变量				
2004年度			-0.005(0.022)	0.050*(0.028)
2005年度			0.043***(0.022)	0.079****(0.029)
2006年度			0.095****(0.022)	0.093****(0.029)
2007年度			0.148****(0.023)	0.211****(0.030)
常数项	0.045(0.087)	0.037(0.089)	0.035(0.091)	-0.076(0.131)
调整后的 R ²	0.065	0.066	0.067	0.087

注:(1)被解释变量为自评身体健康状况。(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3)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差。

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模型二和模型三的计量结果表明,失去土地显著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模型四的回归结果说明,在控制个人职业特征、家庭特征、地区及年度虚拟变量的情况下,有无土地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均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4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失去土地加大了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并且这一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我们在各地的调研发现,造成失地农民的健康状况较差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

第一,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过低,降低了失地农民的健康投资能力,造成失地农民的健康状况较差。现行的征地补偿政策基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执行,该法律规定,应该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有用途给予补偿,补偿款的计算方法是“产值倍数法”,即按照被征用农业用地前3年粮食平均年产值的倍数进行核算。对于被占用的耕地,其补偿费用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3个部分组成。土地补偿费的补偿标准是,被征用土地前3年农业产值均值的6~10倍。被占用耕地的失地农民,得到的上述3项补偿费用总和不得超过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耕地前3年的平均农业产值,各地的标准有所不同。如江苏省将全省划分为4类地区,I、II、III和IV类地区每亩平均年农业产值的最低标准为:1800元、1600元、1400元和1200元。而每一个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助费在I、II、III和IV类地区分别是20000元、17000元、13000元和11000元。失地农民得到的人均补偿款一般为3万元左右。按照江苏省2007年度的消费水平,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全年支出4792元计算,这笔补偿款可以支付生活开支6.3年;而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当年支出10715元计算,则补偿款仅够支付生活开支2.8年。

对于被占用的房屋,国家没有统一的拆迁补偿标准,但各地的补偿标准明显低于房屋的市场价值。比如,山东省济南市每平方米的补偿标准是:钢混结构为750~1100元,砖混结构(楼房)为600~900元,砖混结构(平房)为450~600元,砖木结构(平房)为450~500元,简易结构为200~250元。而济南市二手房的市场价格已达到每平方米8700元,况且新房的价格更高(刘文忠,2011)。农民的原有住房,无论房屋结构还是面临的公共设施都无法与城市的住房相媲美,这也是拆迁补偿价格较低的原因之一。对于失去耕地的农村居民,征地补偿款仅够勉强维持3~7年的基本生活开支,无力进行正常的健康投资。对于原有住房的宅基地也被征收的农村居民,必将面临巨额的住房费用支出。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显示,有地农民的人均住房支出费用,从2003年的1273元增加到2007年的2902元,增长1629元;而失地农民的人均住房支出从2003年的3953元上升到2007年的11981元,增长8028元。2003~2007年,失地农民用于住房支出的金额是有地农民的4倍;失地农民的医疗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9.1%,而有地农民的这一比例为11.3%,失地农民医疗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低于有地农民2个百分点。包括住房需求在内的生活支出对于健康投资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由于失地补偿费用较少,失地农民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健康投资,导致健康状况恶化。

第二,失地农民主要位于城市郊区,这类地区的医疗服务价格较高。居住在城镇郊区,虽然距离高水平的城市医疗机构比较近,增加了失地农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可及性,但是,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的医疗服务价格较高,增加了失地农民的医疗支出,降低了失地农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可得性,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水平。在本研究样本中,有地农民的平均家庭医疗

支出从 2003 年的 629 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1 122 元,失地农民的平均家庭医疗支出从 2003 年的 951 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1 780 元。2003~2007 年,有地农民的家庭医疗支出增加了 493 元,失地农民的家庭医疗支出增加了 823 元,失地农民比有地农民的家庭医疗支出多增加 336 元。然而,由于城市地区的医疗服务价格较高,失地农民多增加的医疗支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同时,生活在城镇郊区的失地农民不得不忍受城市环境污染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加之城镇郊区的流动人口较多,各种疾病的传播风险较大,结果导致失地农民家庭的医疗支出虽然高于有地农民家庭,但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却低于有地农民。表 3 模型四的计量结果显示,有无土地的系数值是 -0.251 ,说明失去土地降低了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实际上,有地农民健康状况较好者的比例,从 2003 年的 56.44% 上升到 2007 年的 61.01%,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失地农民健康状况较好者的比例,除了 2004 年度比 2003 年度略有提高外,从 2004 年的 54.13% 到 2007 年的 54.42%,几乎没有变化,甚至 2007 年比 2006 年还降低了近 1 个百分点。

除了有无土地对农民的健康风险产生较大影响之外,其他一些变量也值得关注。表 3 中模型四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变量的系数值是 0.175,并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的健康状况普遍好于女性。相对于模型一,模型四增加了家庭特征变量,模型一中性别变量的系数值是 0.157,增加家庭变量后,如模型四所示,性别变量的系数值扩大到 0.175,男性的健康状况好于女性。说明在家庭资源约束的框架下,加剧了家庭成员性别之间的健康不平等。传统上,中国农村家庭中女性的地位比较低,虽然近几十年来农村女性的家庭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仍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女性获得家庭健康投资的能力低于男性家庭成员,导致女性的健康水平低于男性。

在表 3 模型四的回归结果中,受教育年限变量和职业培训变量表明,学校正规教育能够促进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职业培训也能够改善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并且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对健康的正向影响分别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调查中我们发现,知识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接受健康教育的能力较强,接受健康知识的途径较多,有较高的自觉性将健康知识用于提升自身健康维护的行动中,从而提高了健康水平。

外出务工和经商收入变量表明,外出务工和经商的收入越多,个人的健康状况越好。随着外出务工或经商收入的增加,则分配给自身进行健康投资的能力也越强,不仅生病时可以得到及时治疗,而且有经济能力做好日常健康防护,促进个人健康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收入与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家庭规模变量的系数值为 -0.03 ,这一结果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人数越多则个人健康状况越差。其原因在于,在家庭预算约束下,家庭人数越多则人均可得到的健康投资较少。有些农村家庭的规模相对较大,减少了家庭成员的健康投资,降低了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而家庭中 65 岁以上老人的数量越多,则个人健康状况越差。老年人口较多的家庭,

意味着该家庭的人口负担较重,家庭收入分配给老人的健康投资较多,则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投资不足,因而降低了他们的健康水平。家庭医疗支出变量的系数值是 -0.38 ,说明医疗费用支出较多的家庭,其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较差。由于中国农村居民普遍存在重视疾病治疗而轻视疾病预防的现象,只是生病时进行治疗,而不注重日常的预防保健,所以,医疗费用支出是身体健康状况优劣的直接表现。

家庭住房价值在经济上对健康的影响系数为 0.024 ,该结果表明,家庭拥有的住房价值越高,个人健康状况越好。由于家庭住房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这说明收入对于促进个人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党员通常具有较高的收入获取能力,健康知识接受能力和健康意识较强,因此党员家庭的成员,其健康水平相对较高。而五保户基本生活所需的粮食、衣物等主要依靠村集体供给,缺少相应的健康投资,因此,五保户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比较差。

地区虚拟变量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好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在统计上显著好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但是,中部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医疗设施较好,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普遍较高,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中西部地区尤其西部地区的农村,不论医疗服务的硬件设施还是医技人员的水平,都有待提高。年度虚拟变量的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于2005年度之后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中国各级政府近几年大力加强农村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是分不开的。中国已经建成了基本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加强基层医疗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公共卫生服务,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的健康。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测点的大样本调查数据,研究分析后发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行为极大地增加了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显著低于有地农民。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限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职业培训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个人务工或经商收入和家庭拥有住房价值越高,个人身体状况越好。家庭老人数量越多,则个人身体健康状况越差。党员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较好,而五保户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较差。男性的健康状况好于女性。另外,中国大多数失地农民位于东部地区,这也体现出中国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更快的特点。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我们建议:(1)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水平。目前实行的征地补偿费用计算方式是“产值倍数法”,这种补偿金额的测算方法,没有考虑到现在的城郊农业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农业,被征用土地的产出价值已不是种植粮食所体现的价值,所以目

前的补偿费用计算方法不能完全反映被征用土地的价值,导致补偿金额较少。由于土地被征用后能够产生巨大的收益,因此,可以考虑将土地增值部分按照一定的比例补偿给失地农民。(2)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的收入获取能力。要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就业培训中心和职业教育中心的力量,加强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并为其提供小额贷款等各种促进就业的措施。(3)加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失地农民大多生活在城镇郊区,医疗卫生条件较差,而城市的垃圾和污水处理厂等往往位于这些区域,再加上这些区域内的流动人口较多,极易造成疾病的传播,因此,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失地农民居住区域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同时,有关部门应该采取有力措施降低医疗费用,严格控制医疗服务费用的上涨幅度,提高失地农民的医疗服务可得性。

参考文献:

1. 代宝珍等(2009):《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与失地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探究》,《中国卫生经济》,第11期。
2. 国家统计局(201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4月28日。
3. 刘文忠(2011):《楼市盘整,济南二手住宅均价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http://www.dzwww.com/rollnews/shandong/201110/t20111010_7306858.htm),10月10日。
4. 吴秀娟等(2009):《城市化进程中苏北地区失地农民心理健康状况与影响因素研究》,《现代预防医学》,第9期。
5. 袁杰、吴广明(2008):《中国失地农民医疗保险问题分析》,《卫生经济研究》,第3期。
6. 苑会娜(2009):《进城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来自北京市农民工调查的证据》,《管理世界》,第5期。
7. 张书旗(2010):《中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第3期。
8. 赵忠(2006):《中国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管理世界》,第3期。
9. 中国财政学会课题组(2011):《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补偿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调研报告)。
10. Campbell C., Cornish F., Gibbs A. and Scott K. (2010), How do Social Movements Persuade the Rich to Listen to the Poor.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5), pp.962-971.
11. Fletcher, J.M., Sindelar, J.L. and Yamaguchi, S. (2011), Cumulative Effects of Job Characteristics on Health. *Health Economics*. (20), 553-570.
12. Glauben, T., Herzfeld, T. and Wang, X.B. (2008),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Food Policy*. (33), 329-340.
13. Grossman, M. (1972), 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0), 223-255.
14. Sharron, M.T. (2006), Land Rights in South Africa: A Mechanism against Poverty. *Development*. (49), 133-137.
15. Zhu, L. (2006), Old Age Security: A Case from Rural Suzhou. *China & World Economy*. (14), pp.68-78.

(责任编辑:朱犁)

ABSTRACTS
Research on Feasible Transition of Age Structure in China

Ma Yingdong · 2 ·

With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changes between the developed European countries and China, 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Wester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ies. Furthermore, the paper has proposed the direction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e criteria of such transition's comple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ge-structure transition theory, and helped with strict definitions of both surplus population and appropriate popul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distinction of demographic age-structure between thos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are undergoing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ose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a near completion of such demographic transition. Finally it concludes that China's transition of age structure is moving towards a feasible direction.

The Dynamic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Level and Mode

Yin Wenyao Bai Yue · 14 ·

Using both STATA panel data model and AMO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ased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ata published by the WCL and UN, this paper has made a gender analysis of current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with focusing on its level trend and correlative factor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is declining continuously, and the women's is increasing earlier and then declining.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takes a trend with shortening in work time and expanding in learning and free developing time. The economic status, education level,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of young age group and age structure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keys to increase labor force with both good quantity and quality are to promote a learning society, to delay those young and minor age groups into labor force by extending schooling years.

"Deregul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Educated Unemployment"

Shi Lei Tian Yanfang · 28 ·

This paper tempts to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for China's "educated unemployment" phenomena. Our established theoretical model finds that along with the deregulation of labor mobility, looseness of wage control and the growth of the educated there is a rise of "educated unemployment". However, with further easing of labor market regulation, "educated unemployment rate" will then begin to decline. The paper shows that early relaxing the control of labor market results in "educated unemployment", and this increase of "educated unemployment" is only temporary and periodical. With advancing the reform of labor market, the "educated unemployment" phenomenon will reduce or even fade out. Empirical analysis has showed that to the "educated unemployment rate", labor mobility and wage control deregulations are all significant in 2002 samples, but in 2009 samples only labor mobility deregulation remains significant.

Demographic Effects on Savings, Investments and External Balance: Evidence from Asia

Zhu Chao and Others · 39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mographic effects on savings, investment and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by using Dynamic GMM Estimation based on a large cross-country time-series data set in Asi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re exists substantial demographic effect on savings, and that higher elder dependency ratios always associate with lower savings rates and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However the effect of youth dependency ratios is weaker than that of elder dependency ratios, and there is a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child-raising quality and quantity. Also the effect of elder dependency ratio is very significant to the external balance. There i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conomy of an aging entity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Asia's current accounts with high savings due to demographic bonus can be seen as an international buffering and distributing pool. These findings can be used to explain Asia's high savings, high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Given the demographic effects, the world economy should avoid the synchronization of aging cycles to ensure inter-temporal transfer of resources and the "global sequential development". Besides, perhaps more tolerances on external imbalance are necessary.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Monopolies on Wag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Liu Yulin Mei Bin · 51 ·

Using the data on Chinese listed firm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02 to 2009,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 monopolies on wage rates. We find that the wage rates in monopoly industries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industries, and this wage gap has gradually

widened in our sample period. Moreover, our evidence shows that high wage rates in monopoly industries hardly improve the firm performance. This suggests that unreasonable higher wages exist. The paper also finds that the wage gap between the top executives and the employees is smaller in monopoly industries than the gap in the other industries, implying more equitarian income distribution within monopoly industries.

The Impacts of Catching-up Strategy and Factors Market Distortion on Chinese Employment:

A Study Based on Chinese Enterprises-level Data

Kang Zhiyong ·60·

Using the data of micro-dat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07,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local government's catching-up strategy and factors market distortion (FMD) on employment. We find that such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s caused the abnormal growth of capital-intensive industry and biased technical progress, irrationally substituting capital for labor and eventually leading to an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with weaker ability of employment absorption. Meanwhile those effects are different among the firms with different size.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orrect their behaviors and alleviate distortion of factors market to make technology progress gradually be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 This will reduce substitution of technology progress for employment and eventually help employment growth.

Inter-generational Heritage of the Assimil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Zhou Hao ·70·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heritage of the assimilation, and analyzes the effect of the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some family backgrounds on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ssimil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PSDMC).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migrant children helps to develop the children's assimilation. Meanwhile school effect is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mily background. The assimil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has the properties of inheritance and plasticity. Inheritance affects more on the beginning level, and the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and slope. Therefore,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improve migrant children's family environment and adapt better parents' teaching approach.

A Study on Uneven Children's Education Resources: Based on children's Education in China's 31 Provincial Areas

Wan Guowei ·82·

Equity of education resources has always been a core issue of children's welfare, therefore assessment on effectiveness of present education policy is necessary. Using cluster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technology of SPSS software to make a comparison on children's education in China's 31 provincial regions, the study find the decreasing trend from eastern areas to western provinces in children's education welfare, namely "better eastern vs. worse western". Meanwhile, current educational welfare policy fails to form a reversing effect. This article suggests priority to promoting China's education fiscal expenditure system, multiple welfare participation system and teacher resource guarantee system, in order to equalize education welfare supply among provinces.

Theory and Evidence of Female Graduates' Job Search: A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63 Universities

Zhang Kangsi Ying Shuai ·94·

Based on the job search theo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Logistic Multiple Sorting Model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the data of 63 universi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China, gender plays a negative role when female graduates hunt for jobs. The job searching hypothesis is not applicable to female graduates. Meanwhile, factors that affect job hunting are different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graduates. For the females, the factors such as opportunity, mastered skills, spirit of hardworking, working capacity, ideas and culture and ages play positive roles in job hunting, whereas for males, the factors such as leadership experienc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rnship experience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physical appearance play more significant roles.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equal working circumstance, improv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female graduates and enhance career services in colleges.

A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Land-less Rural Residents under Land Requisition

Qin Lijian Jiang Zhongyi ·102·

As China urbanizes, land requisition puts higher health risks over those land-less rural residents,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from 2003-2007's large rural household survey. The health status of land-less farmers is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at of those being with land. It is mainly due to insufficient compensation for the requisitioned l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landless rural residents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amending current land requisition policies,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and improving the earning capacity of land-less farmers.